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其他我国主要领导人著作

(著作与汇编)

马、恩、列、斯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3)

原著:马、恩、列、斯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论培尔

使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儿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比埃尔·培尔“对十七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论休谟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唯心主义干脆被丢到一边，经验开始被看做唯一的救星。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这样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光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最后，在一切解决矛盾的尝试失败以后，英国哲学就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足以胜任的；于是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形式。这种世界观的代表者说，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什么神存在；即使有的话，他也根本不可能和我们发生任何联系，因此，我们在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时就应该假定什么神也没有。我们无法知道，究竟灵魂和肉体有没有区别，究竟灵魂是不是不死的！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假定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忧虑。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的实践完全重复着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理论的领域中。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9—660页

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9页

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休谟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而这个不可知论的观点注定要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2页

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具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论著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著是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

休谟，大卫（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著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1页

论康德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他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0—451页

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年5月或6月）。

康德（1724—1804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二元论者。他在早期创立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编者注

指伊·牛顿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第3册的结尾部分《总识》中所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着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hypothesesnonfingo]。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概括。”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意见，他在《哲学全书》第93节附释1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编者注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只是在现在才被入理解。”——编者注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

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的状况，由于他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

立，所以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方面对这种沃尔弗的幻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

论费希特、谢林

事实上，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紧跟着康德之后就产生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阿芬那留斯的批判正好是同一方向。在德国古典哲学里，这种方向的代表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信徒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徒费希特。1792年舒尔兹-埃奈西德穆批判过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承认先验主义和自在之物。舒尔兹说道，我们这些怀疑论者或休谟的信徒摒弃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自在之物。……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这样批判康德，不过更坚决些。他说，康德承认不依存于我们的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83页）；康德“没有明确地”把“实在论”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费希特认为康德和康德主义者最不彻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基础”（第480页），因此他们便陷入和批判唯心主义相矛盾的境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97、198—199页

在我们所考察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中，除了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消除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然而这是刷新了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莱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规定”（创造、产生）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4—65页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1762—1814年），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1775—1854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后来成为科学的凶恶敌人，宗教的拥护者。——编者注

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445页

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

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

论黑格尔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

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象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

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许诺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以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以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论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象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

费尔巴哈（1804—1872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唯物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编者注

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

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绝对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冲击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马上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体系的秘密”宣告“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象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

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先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论狄慈根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1页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和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撇开他的叙述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第222页及第271页）和“辩证唯物主义”（第224页）。狄慈根说：“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第222—223页）“认识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真理泉源，而是反映世界的物或自然界的类似镜子的工具。”（第243页）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回避研究狄慈根的每一个个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点，而抓着他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252页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制革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编者注

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版的页码。——编者注

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

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象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末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3—374页

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无知的人（包括欧·狄慈根）就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当然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化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要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分别清楚。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因为这里有着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这篇文章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 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的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不能彻底认识的东西（Unauske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

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和对比的目的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的时候，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正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反科学地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为两个彼此 *toto coelo* 完全地、根本地、原则地不同的并且不包括在任何一般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18—119页

在约·狄慈根从事写作的时候，正是单纯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

的时代。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约·狄慈根在强调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时，往往陷于混乱状态，以至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多少能够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即维护这个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并列，或者整个地让位于信仰的学说。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a》是不的意思，《 》是知识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动摇的。康德（康德主义者）、休谟（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的拥护者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因此某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臭名昭著的非开化论者和僧侣主义的公开拥护者，曾试图“利用”约·狄慈根的错误。

但是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约·狄慈根写道：“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个“只有”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

约·狄慈根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承认人类认识器官不会放射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来，它是自然界中一个反映自然界其他各种片断的片断。”这也就是人类认识永恒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物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教授式御用哲学的仇视和恐慌，诽谤和歪曲。约·狄慈根怀着多么深厚的真正革命者的热情抨击并痛斥了唯心主义教授们和实在论者等等这些“僧侣主义的老牌走狗”！约·狄慈根关于哲学的“党派”，即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正地写道：“在所有的党派中，最卑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

—63页

约·狄慈根尽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一帜“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

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aser）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

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列宁原注）

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

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列宁原注）

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末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

正是如此！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46—347 页

见他在 1876 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论文集》1903 年版第 135 页。（列宁原注）

论孔德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 1832 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7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36 页

您对奥古斯特·孔德的评述使我很感兴趣。谈到这位“哲学家”，我认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孔德曾经给圣西门做过五年秘书，而且是他的挚友。圣西门确实吃了思想丰富的苦头；他既是天才，又是神秘主义者。明确透彻的表述，条理化、系统化，非他的能力所及。因此，他就为自己找到了孔德，此人在师父死后应能把这些盈盈欲溢的思想条理化而后公之于世；和其他喜爱幻想的学生相反，孔德的数学修养和思维方式看来特别适于完成此项工作。可是，孔德突然和“师父”决裂，退出了这个学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以他的《实证哲学》显露了头角。

在这个体系中有三个突出的因素：

（1）有许多天才思想，但是几乎照例都或多或少地遭到损害；这是由于（2）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和这种天才处于完全对立地位，使这些思想得不到充分的阐述；（3）一部完全来自圣西门主义而又摆脱任何神秘主义的宗教宪章，它是极其荒诞地按教阶制度编制起来并以一个合法的教皇为首脑，这就使得赫胥黎谈到孔德时说，孔德主义是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

我敢说，第三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的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的矛盾；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尽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们加以改作。从许多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些思想是来自圣西门，而且我坚信，如果有人认真地从事这个工作，一定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发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圣西门本人的著作在 1830 年以后被圣西门的学派和教义的喧声所湮没的话，这种情况一定早就发现了，它们把“师父”的学说的个别方面加以强调和发挥，却牺牲了他的整个宏伟的思想。

恩格斯：《致菲·腾尼斯（1895 年 1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374—375 页

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从圣西门那里抄来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套整理法在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因而就导致那种愚蠢的全科教育，在那里，不到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另一门科学，在那里，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斥为异端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3—424页

论马赫、阿芬那留斯

马赫是现今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6—17页

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太人的接吻对于耶稣一样。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反动现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55—356页

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学生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 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合逻辑的。”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用这种狡辩只是掩盖形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

马赫，恩斯特（1838—1916年），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阿芬那留斯，理查（1843—1896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从1877年起担任苏黎世大学的教授。——编者注

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349页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清洗了一般经验”，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学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64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是一些矛盾的没有联系的认识论命题的堆砌。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

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以及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没有深刻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认清他们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因而就没有看出他们后来想偷运唯物主义这一企图的非法性和折衷性。但是，正如在哲学文献中大家公认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一样，大家也公认后来经验批判主义力图转向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页

论配第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见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并且还是别号兰斯唐侯爵的英国辉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43页注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到1752年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因此，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7页

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一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一开始就用需要等量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一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 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重复这个基本命题的地方，从这个基本命题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

配第，威廉（1623—1687年），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编者注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利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 natural Par），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1—272页

论魁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3页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包括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生产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所消费的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7页

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

亚·斯密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引用了米拉波侯爵的夸张说法：

“自从世界形成以来，有三大发明……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这个表是前两者的结果和完成。”（加尔涅的译本，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40页）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

魁奈，弗朗斯瓦（1694—1774年），法国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为医生。——编者注

《经济表》——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表》中第一次制定的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表。——编者注

——编者注

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至于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仅资本同资本的交流，而且资本同收入的交换，那末，斯密实际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财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格的分类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过程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得象《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65—366页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5页

论富兰克林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他说必须撇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6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5页

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着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第2版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页注（17a）

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注（13）

富兰克林，本杰明（1706—1790年），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编者注

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121页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都是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6页

我们看到，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因此，他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时间，不是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会劳动。而在这特定种类的劳动中，实际上创造剩余价值的又是自然，是土地，剩余价值被理解为物质（有机物质）的量的增加，理解为生产出来的物质超过消费了的物质的余额。他们还只是在十分狭隘的形式中考察问题，因而夹杂着空想的观念。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剩余价值，无论它表现为利润、地租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派生的利息形式，都不过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在同活劳动交换过程中占有的这种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64页

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个错误，在李嘉图和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矛盾和荒谬的东西（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他更加系统而一致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了价值的基本规律，所以不一贯的说法和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一切，李嘉图学派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我们在后面关于利润那一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69—71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

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与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4—125页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十分危险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3—564页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

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525]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因此，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中去了。”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子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74—75页）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81—183页

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9页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我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论西斯蒙第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象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在这部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象他极其恰当地称为的“庸俗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并且对古典派也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始终力图不离开严格科学研究的道路。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书评——为〈未来报〉作》（1867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3页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

“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布阿吉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1页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我们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指出它们以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解释它们的起源、发展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1773—1842年），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指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做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关于消除它们的格言、揭露、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现实利益。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利益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的矛盾）当做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 Kleinburger 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同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94—195页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所有最主要的原理。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甚至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也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在各方面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63—164页

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采取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联合当做规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规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壁垒，消除地区、地域、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做规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劳动不是在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内社会化，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社会化，甚至这种社会化已超出一国的范围。

正是这种错误使得浪漫主义者完全应该归入反动者之列，但说他是反动者，不是说他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的秩序和传统中去找寻规范。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03—204页

论马尔萨斯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

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

（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

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573页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1766—1834年），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编者注

效的办法。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页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

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会反对无产阶级。从这个理论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主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3—124页

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报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观点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维护鼓励谷物输出的出口奖励和限制谷物输入的进口税，决不是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于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

指唐森的《论济贫法》。——编者注

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1—122页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他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证明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贫困所作的辩解，但首先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特别是要证明英国立法当时为了保护贵族利益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倒退措施是正确的。最后，[498]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反对李嘉图的，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及其生产率依以发展的那些规律的绝对要求，纳入从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属的教会）、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和食税者的现有利益看来是“有利的”和“适宜的”“范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5—126页

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注（15）

论约·穆勒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214页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政治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0页注（65）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1806—1873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编者注

论罗雪尔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文献，是个可敬的人物……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越来越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他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那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各处搬用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2年6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24—625页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以真正哥特谢德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注（30）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1817—1894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编者注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修昔的底斯是著名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做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Die Grundlagender Nationalökonomie》）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编者注

指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哥特谢德。哥特谢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编者注

论阿庇安

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论毛勒

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4页

格·路·毛勒的著作如下：

（1）《德国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

（2）《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3）《德国农户制度史》，四卷。

（4）《德国城市制度史》，二卷。

（5）《德国乡村制度史》，二卷。

第（1）（2）最重要，但其余的也很重要，尤其是对德国的历史来说。论述重复，文笔拙劣，条理紊乱，给研究这些一般说来却是极好的书造成了困难。他真不愧是一个德国人！

恩格斯：《致斐·多·纽文胡斯（1886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6页

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国家枢密官，当时曾以希腊摄政王之一的身份出现，他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俄国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老毛勒的这些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这是南德意志人有别于北德意志人之处（毛勒是海得尔堡人，但这在更大程度上还可算作巴伐利亚人和提罗耳人，例如，法耳梅赖耶尔、弗腊斯等人就是这样）。书中有的地方还猛烈地抨击了老格林（《古代法》），就是说，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进行抨击。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

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1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1790—1872年），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编者注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页

论巴霍芬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象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奇迹：推翻了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终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 1861 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 年 6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8 页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致，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1815—1887 年），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的作者。——编者注 2J

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杂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杂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情况，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形式之外发生这种关系；并且至少包含着已有可能发生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27页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7页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页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47页

我认为，巴霍芬的新发现可以归结为：

（1）他所称的杂婚，（2）母权制是杂婚的必然后果，（3）因此，妇女在古代受到高度的尊敬，（4）向一个女子专属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包含着对其余男子所享有的对同一女子的那种传统权利之侵犯，这样，就必须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补偿这种侵犯，或换取对这种侵犯的容忍。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6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0页

论麦克伦南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并指出，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象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1827—1881年），苏格兰资产阶级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编者注

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术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页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

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论，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见的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骤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页

论摩尔根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页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注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1818—1881年），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指《反杜林论》发行第三版时恩格斯认为有一章须作增补。——编者注

恩格斯指的是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编者注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的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3—14页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 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页

论基佐、米涅、梯叶里

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ancien re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基佐先生不是根据二月革命的经验来理解1830年的法国王朝和1688年的英国王朝的历史情况及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不同之处，而是用一些说教式的词句来抹杀它们之间的一切区别，并且在结语里保证说，2月24日破了产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1787—1874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编者注

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1796—1884年），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着手解释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创建史中的作用。——编者注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1795—1856年），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近于了解物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用。——编者注

指基佐、米涅、梯叶里、梯也尔。——编者注

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的政策“保存了国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7页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 *us et coutumes* [风俗和习惯] 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拉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哥也企图建立共和国，而且也象英国一样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没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

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 7/10 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49—251 页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51—252 页

1875 年左右去世的若尔日·阿韦奈耳的著作《革命星期一》、《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过的小品文集以及《阿那卡西斯·克罗茨》，无疑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优秀著作。后面这本书结合克罗茨的生平，对到 1794 年热月政变为止的整个革命进程作了概述。这部著作是用传奇的笔调写的，所以要得出明晰的观念，还得时常向米涅 或梯也尔 去找确切的材料。但是阿韦奈耳勤奋地研究了一些档案，因而提供的新的和可靠的材料非常之多。这对从 1792 年 9 月到 1794 年 7 月这段时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资料。……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

恩格斯：《致菲·多·纽文胡斯（1886 年 2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26—427 页

1853 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感

弗·米涅《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阿·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到很大的兴趣。令人奇怪的是，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公使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人：僧侣、贵族和其寺可以通称之为人民的那些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 cap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此外，他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缺少适当的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

(1) 法国资产阶级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出现以后，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象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毫无疑问地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

(2) 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任何著作也没有把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作过这样好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行会师傅，行会负责人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阐明并强调了的东西，就是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精神完全一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1—383页

论克劳塞维茨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是著作家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之后不久，对战争史作了考察，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后说的。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已经成为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大约在八十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鄙陋的偏见：似乎战争同有关政府和有关阶级的政治没有关系，似乎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把战争看做只不过是举行进攻，破坏和平，后来又把这种被破坏的和平恢复起来。相互厮杀而又言归于好！这就是还在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粗鄙的观点，实际上，只要对任何战争史稍微作过仔细研究，都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1780—1831年），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编者注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8月23日）。
《列宁选集》第2卷第673页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列宁赞颂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当时已享有军事问题权威声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其次，列宁赞颂克劳塞维茨，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456页

为了写布吕歇尔，我多少翻阅了一下克劳塞维茨的书。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8页

目前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对于是否应当使用军事学术或军事科学这一名称的问题，答案是：战争最象贸易。战争中的会战就等于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发生，但一切仍以它为目的，而且它最后必将发生，并起决定性作用。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月7日）》。《马

见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1卷第1篇第1章第24节。——编者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Karl von Clausewitz：《Vom Kriege》），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谁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各国政府间和各个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这样想，似乎战争一开始，这种关系就会中断，并且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己特殊规律支配的形势。我们的论断恰恰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通过另一种手段干预的继续。”（列宁原注）

论勒南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门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在荷兰和瑞士就象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说得好：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象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

恩格斯：《启示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页

我正在这里研究早期的基督教，在读勒南的书和圣经。勒南是一个异常肤浅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非宗教人士，他比德国大学神学家的视野要广阔一些。可是，他的书简直是一部小说。他自己对菲洛斯特拉特的评语，也适用于他这本书：它可以作为历史资料采用，就象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可以用来研究弗伦特运动时期一样。在某些细节地方，我发现他有骇人听闻的错误，同时他还非常无耻地抄袭德国人的东西。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92年8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27页

谈到拉撒路，不禁使我想起勒南的《耶稣传》。在某些方面，这简直是一部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幻想的长篇小说。这本书与它的德国前辈相比，还是具有某些长处，而且书并不太厚，所以你应该读一读。这自然是德国人研究的结果。非常值得注意。在荷兰这里，德国的神学批判的思潮非常流行，以致牧师在传教台上公开宣扬这种思潮。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1页

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1823—1892年），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编者注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编者注

论哥白尼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1876年
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
—447页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8—449页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22页

哥白尼（1473—1543年），波兰人，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编者注
指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编者注

论伽利略、刻卜勒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结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在 1730—1740 年这一时期，贝利多尔在法国拉费尔，罗宾斯在英国以及帕帕契诺·丹东尼在都灵都领导了这种试验。结果，火炮的口径大为统一，火炮各部分的金属重量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装药的重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发展炮兵学原理方面，也取得了象上述改进那样大的进步。伽利略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别尔努利、沃尔弗和欧勒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验家对炮兵学中数学方面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恩格斯：《炮兵》（1857 年 10—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202 页

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据这个定律，落体所经过的距离和落下所经过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又提出一个不完全符合这个定律的命题：一个物体的动量（它的冲量或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它在质量是常数时就和速度成正比了。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认为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就是该物体的运动的量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426 页

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7 页

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 页脚注

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 年），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编者注

刻卜勒，约翰奈斯（1571—1630 年），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编者注

论牛顿

新兴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它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特别是归功于刻卜勒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二人那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4页

十八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十八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没有说明而是描画出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给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给定的。应当怎样从这些数据中说明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用现在已成为一种必要假定而且我们不得不加以采用的切线力来说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第一次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运动本来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限于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 X ，就是说，因为牛顿所要求的，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7—618页

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体分离的一刹那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己发生了矛盾，它一方面表现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8页

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9页

牛顿，伊萨克（1642—1727年），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编者注

论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证实了他的观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页

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飘荡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8页

……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1749—1827年），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编者注

论迈尔、焦耳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 1842 年总结出来。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52 页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公斤米去表现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现一个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之亦然；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现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5—526 页

赫尔姆霍茨在他的《通俗讲演集》第 2 卷第 113 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上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方面不变的原理的功绩，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也有他自己一份。“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迈尔和柯尔丁，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一切可以从上述观点得出的自然界各种过程间的关系，而且在 1847 年在以《论力的守恒》为名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什么超过 1847 年科学水平的新东西，只有下面两点是例外，一是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1814—1878 年），杰出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科学家之一。——编者注

焦耳，詹姆斯·普雷斯科特（1818—1889 年），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1843—1850 年他曾通过实验证明机械功能够产生热，他测定了热的功当量，因而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一个根据。——编者注

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价值的数学上的证明：“力的守恒”和作用于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各个力的中心作用，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其次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特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方面，赫尔姆霍茨的这本著作都已经被迈尔的 1845 年的第二篇论文所超过。在 1842 年迈尔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而在 1845 年他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在“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关系”方面说出了比赫尔姆霍茨在 1847 年所发表的高明得多的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00 页注

恩格斯指的是迈尔的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1842 年发表）和《与新陈代谢联系着的有机运动》（1845 年发表），两篇文章收入尤·罗·迈尔《热力学论文集》1874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编者注

论波义耳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页

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末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或许就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内寸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34页

波义耳，罗伯特（1627—1691年），杰出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最先提出化学元素的科学定义，试图把机械原子论的观念运用于化学，研究过定性化学分析；发现了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的定律。——编者注

论拉瓦锡、道尔顿

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面，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1页

物理学也正是在十八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相应地，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开始的（是从运动形式互相转化的发现开始的，这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7页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

拉瓦锡，安都昂·罗朗（1743—1794年），杰出的法国化学家，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编者注

道尔顿，约翰（1766—1844年），杰出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发展了化学中的原子论思想。——编者注

论门得列耶夫

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到了光辉的证明。门得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他预先描述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一般化学性质，他称之为亚铝，因为它是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后面的；他并且大约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真的发现了这个元素，而门得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极不重要的差异。亚铝体现为镓（同上，第828页）。门得列耶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490页

门得列耶夫，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1834—1907年），伟大的俄国学者，1869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

——编者注

论卡尔·肖莱马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858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 chemist 广开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 chemist 安格斯·史密斯当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书学院的化学教授。1861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得到了欧文书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象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首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

1874年欧文书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

肖莱马，卡尔（1834—1892年），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编者注

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東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恩格斯：《卡尔·肖莱乌》（1892年7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3—365页

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学会（这里的科学院）会员，他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争中取得的，——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俏皮话等等，……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3年12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2页

您就安许茨的事给我写了信，我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把写这封信的时间推迟了几天。但直到今天，什么也没有了解到。

问题在于：首先我必须知道，这个传记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给一家杂志写的，究竟是什么杂志，等等，等等。如果安许茨打算把我们的卡尔仅仅作为一个化学家来写，那么他只需要一些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轮廓的材料就行了。但如果他要写卡尔这样的人，那未试问，他是否胜任这个工作，而且能否就这样随便地把卡尔的书信给他使用。况且，一个居住在德国的化学家必然是不会了解一个在英国度过三十多年的人的生活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大堆工作就要落到我的肩上。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只要我把现在重新着手进行的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一结束，我乐于把我的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件事上。但谁能担保这些材料一定能按照我说的精神来使用呢？卡尔在我们中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有几次夏天去德国以外，他在伦敦这里度过了所有的假期，——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化学界至今还不常见。要知道，总不能让传记的作者似乎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不幸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对读者怀有歉意吧！

恩格斯：《致路·肖莱马》（1892年10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96—497页

安许茨，理查（生于1852年），德国有机化学家，波恩大学教授（1884年起）。——编者注
卡尔·肖莱马。——编者注

论达尔文

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1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再把同一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2—163页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达尔文（1809—1882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他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编者注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歷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0—131页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5页

真的，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

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在恩格斯写这封信前几天，即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110页

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

……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5页

论特雷莫

有一本很好的书，一旦我做好必要的摘记就寄给你（但是以寄还我作为条件，因为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的），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它的两个基本论点是：异种交配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产生差别，而是产生种的典型的统一。反之，地质的构成（不光是它本身，而是作为主要的基础）造成差别。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同样，纯过渡类型迅速消失而种的发展缓慢的问题，也解释得很简单，因此，那些对达尔文有妨碍的古生物学上的空白，在这里是必然的。同样，一经形成的种的稳定性（且不说个体偏离和其他的偏离）是必然的规律。使达尔文感到很困难的杂交，在这里反而是分类的依据，因为它证明，实际上只有在异种交配停止产生后代，或者异种交配成为不可能等等之后，种才会确定下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0—251页

关于穆瓦兰和特雷莫，我将在这几天较详细地写一写；后者的书我还没有读完，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关于黑人圣玛丽亚以及关于白人变为黑人的事，简直要笑死人。塞内加尔黑人的传说似乎值得无条件相信，这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写作！更妙的是，把一个巴斯克人、一个法兰西人、一个布列塔尼人和一个亚尔萨斯人之间的差别归结到土壤类型的不同上，而土壤类型不同的罪过自然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四种不同的语为什么我们这些居住在我们的泥盆纪的过渡层（这些岩山早在石炭纪以前就已经上升到海面以上）上面的莱茵省居民很久以来没有变为白痴和黑人；也许他在第二卷中会加以解释，或者会宣布我们实际上就是黑人。

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10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8—259页

关于特雷莫。你的评语是：“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你的这种评语，在居维叶的反对物种变异说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他在那里就嘲笑德国的科学幻想家，说这些人把达尔文的基本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不过不能证明它。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是表述新思想的人，尽管居维叶是大地质学家，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在我看来，特雷莫关于土壤影响的基本思想（自然他没有考虑到这种影响的历史性变化，而我认为由于耕作等所引起的土壤表层的化

比埃尔·特雷莫，法国自然科学家。——编者注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

学变化，以及象煤层等这些东西在不同生产方式下所起的不同影响，也都属于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是这种只需要表述出来以便在科学中永远获得公认的思想，而这完全不依赖于特雷莫叙述得如何。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0页

关于特雷莫。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对各学派的批评，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达尔文对杂交的变异影响的想法也有正确的一面，其实特雷莫也默认这点，他在对自己方便的地方也把杂交看做是变异的手段，尽管最终还是起拉平作用的手段。达尔文等人并没有否认土壤的影响，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特别强调这种影响，那只是因为不知道土壤是怎样发生影响的——除了知道肥沃的土壤发生良好的影响，贫瘠的土壤发生不好的影响。其实特雷莫所知道的也不见得比这多多少。关于晚形成的土壤一般说来对于高等种的发展更为有利的假说，含有某种颇为合理的成分，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当我看到特雷莫想用多么可笑的证据（这些证据十分之九是根据不可信的或被歪曲的事实，而十分之一是什么也没有证明）来证明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把对假说创造者的怀疑转向假说本身。当他进一步宣布由杂交校正过的较新的或较老的土壤的影响是造成有机的种以及人种变异的唯一原因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就没有理由跟着这位作者跑这样远了，相反，我还有了许许多多反驳这种说法的理由。

你说居维叶也指责过肯定种的变异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不懂地质学，可是这些哲学家是正确的。不过那时这个问题与地质学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作者完全依靠地质学来创造种的变异性的理论，同时又犯了这样一些地质学上的错误，歪曲一系列国家（例如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地质，而自己其他的证据又是从一些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地质情况的那些国家（非洲，中亚细亚等）弄来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关于人种学方面的例子，凡是和人所共知的国家与民族有关的，无论就地质条件，或者由地质条件而得出的结论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全是错误的；作者把大量的和他的理论相反的例子完全放过去了，例如，西伯利亚内部的冲积平原，亚马孙河的广大冲积盆地，拉普拉塔河以南几乎直到美洲的最南端（科迪勒拉山脉以东）的整个冲积地区。

土壤的地质结构与一般能生长东西的“土壤”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就象这种能生长植物的土壤对生活在它上面的动植物的种产生影响一样。而到现在为止这种影响几乎还没有被探讨过，这也是事实。但是从这里到特雷莫的理论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这的确是他的功绩！并且如我已经指出的，关于土壤因其地质年代大小的不同而对加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但是他所做的所有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10月5日）》。《马

论海克尔

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0页

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6页

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一点一方面异常突出他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是有党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斗争是有真正的社会意义的。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并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低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家现在都拥护“素朴实在论”的观点。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逊、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只有天晓得他们的名字的人）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主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1834—1919年），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编者注

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

在这整个悲喜剧中，最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争吵起来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海克尔的哲学具有素朴性，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重视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同宗教有妥协倾向而且还提出有关宗教的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它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动理论一直到自以为是最新颖、最进步和最先进的彼得楚尔特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整个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说来，都是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群众和自己隐瞒的东西，即那块日益宽广和坚固的磐石，这块磐石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末流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
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56—358页

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渎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道地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列宁原注）

论哈维

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4页

哈维，威廉（1578—1657年），英国著名医生，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编者注

论施旺、施莱登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外，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

可是，人们对最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首先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其次是最近二十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的成就还要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7页

我偶然翻阅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页*

* * *

施旺，泰奥多尔（1810—1882年），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1839年提出了构成有机体的细胞理论。——编者注

施莱登，马提阿斯·雅柯布（1804—1881年），德国大植物学家，1838年曾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编者注

论但丁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 1300 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893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9 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 年 10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4 页

论莎士比亚

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5页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12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8页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1854年4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88页

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伟大的英国作家。——编者注

指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编者注

兰斯是莎士比亚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编者注

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十达》（1748）所写的题为“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一篇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现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间，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编者注

概念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60页

论歌德、席勒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 [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年底—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歌德（1749—1832年），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编者注

席勒，弗里德里希（1759—1805年），伟大的德国作家。——编者注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

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页

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见《现象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228页

论拜伦、雪莱

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

恩格斯：《伦敦来信》（1843年5—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1—562页

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拜伦，乔治（1788—1824年），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雪莱，派尔希·毕希（1792—1822年），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编者注

论巴尔扎克^巴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顺便说一下，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于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式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巴 尔扎克，奥诺莱（1799—1850年），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编者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46 页注 (28a)

论赫尔岑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6页

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21—422页

赫尔岑是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大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们，并且把他们“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

赫尔岑（1812—1870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编者注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起义而得名。——编者注

[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6—417页

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497页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象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29页

在农奴制崩溃的时候，出现了一执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一般解放运动的、特别是民主主义的没有经过审查的报刊的主要群众活动家。民粹主义成了符合平民知识分子观点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流派永远不能同右的自由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但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发自由派贩卖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直到现在还痛恨的。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1914年4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1页

虽然若干世纪的奴隶制把农民群众压得这样厉害，使他们这样愚昧无知，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是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页

正是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在当时，在农民改革刚进行的时候（那时它甚至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样清楚地懂得这个改革的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才能懂得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和“国家”中已经是那些永远敌视劳动者、绝对使农民破产和遭受剥夺的社会阶级占统治和支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文学批评家。——编者注
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配地位了。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得一个掩盖我国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政府的存在是使劳动者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大祸害。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59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粉饰、后来甚至加以歌颂的61年的“农民改革”，称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的性质，清楚地看到，那些自由派的解放老爷们把农民抢得精光。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六十年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面前战战兢兢、他们在统治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0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一直到他一生的最后一天（即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都在嘲笑时髦的“实证论者”（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等等）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作的种种让步。

列宁：《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914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9页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

论托尔斯泰

早在农奴制度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1页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列甫·托尔斯泰的说教究竟反映了什么人的观点呢？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的主人，但是逐没有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和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1910年12月18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已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糰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

托尔斯泰（1828—1910年），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家。——编者注

这是列宁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引用的诗句。——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一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371页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3页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

其次，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派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指示：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恰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正在“安排”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活动的性质愈明确，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的意义和任何理论的根据”。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

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年1月22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36页

论海涅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1833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0—211 页

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 1813 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4 年 11 月 9 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91—592 页

为了让我们怀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手，它通过《诗册》（海·皮特曼编，1847 年赖希附近的波尔拿出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庆祝会作为收场。在大熊的庇护之下，放出了旋转焰火，就是在罗马复活节也看不到比这更明亮的焰火。所有社会主义诗人都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供应了凡把必不可少的焰火。这些焰火状如麦束，滋滋作响，闪闪发光，升到天上，噼啪地散在空中，化作亿万颗星星，把我们黑夜般的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不消片刻焰火就熄灭了，剩下只是浓烟一片，使夜色

亨利希·海涅（1797—1856 年），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编者注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 1834 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 1833 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编者注

比实际上更加漆黑。只有海涅的七首诗，象一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透过这片浓烟射出光芒，这七首诗出现在这伙人中间，使我们非常惊讶，也使大熊狼狈不堪。

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年1—4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3页

精致的文学始于海涅；它的使命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在诗歌中这已经作到了，至于散文则比已往任何时候还坏。

马克思、恩格斯：《德法历史材料，关于德国的笔记》（1789—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俄文版第10卷第351页

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

恩格斯：《致受·伯恩施但（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页

论维尔特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

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1883年5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8页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狼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象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狼袭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象罗曼语民族那样，就象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象旧的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不过，维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一些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1883年5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1822—1856年），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编者注

指维尔特。——编者注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1810—1876年），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成为革命诗人，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编者注

论鲍狄埃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

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三千六百张选票中，有三千三百五十二票是选他的。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九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Père Lachaise），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夺取红旗，组织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

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法国工人诗人，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的作者。——编者注

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发表于1913年1月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436页

论高尔基

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巩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这正好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怎么竟做出这种事情？这简直太糟糕了，真的！

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叫嚣”的回答，本来感到很高兴，今天取消派的报纸来了，上面刊登了您的一段文章，这段文章在《言论报》上是没的。

这一段文章这样说：

“至于‘寻神说’，应当把它暂时<仅仅是暂时吗？>搁下，这是一种无益的事情：在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寻找。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而要创造生活。”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

您竟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好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好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干好尸勾当的“民主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在探索，怎么能够在您那儿发生这种笔误，但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的残余吗？？

高尔基（1868—193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1934年曾任苏维埃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小市民》、《母亲》、《童年》等。——编者注

是它的余波吗？？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您想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吗？也许是为了同“一般民主派”谈话而打算象同孩子说话那样奶声奶气吗（请原谅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许他的或者他们的（庸人的）偏见吗？？

但要知道，无论从哪种意义和哪个方面来说，这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列宁：《给阿·马·离尔基（1913年11月中旬）》。

《列宁选集》第2卷第481、482—483页

要想在彼得格勒或者从彼得格勒来确信这一点，只有非常了解政治情况，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行。您没有这一切。而且，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榜徨迷惘，悲观绝望，呻吟叹息，重复旧成见，担惊受怕，惶惶不安。

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设生活的工作，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农村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只观察就行了。可是您不这样做，反而把自己摆在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听病态的知识分子的牢骚上，浪费在观察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上。

您使自己所处的地位，使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

显然，您把自己已经弄到了病态的地步：您来信说，您对生活非但感到很沉闷，而且“非常厌恶”！！！！那是当然的！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困在一个最头痛的地方，作一个翻译文学的编辑（这可真是对于观察人，对于一个艺术家最适当的工作！）。在这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进行观察和研究。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在彼得格勒可以搞政治，但是您不是政治家。今天是无端打碎玻璃，明天是枪声和狱中的叫喊，接着是留在彼得格勒的不工作的人中最疲惫的人的一些闲话，然后又又是知识分子的、没有首都的首都知识分子的千千万万的印象，接着又是受委屈的人们的千百种诉苦，在编辑工作之余不可能看到任何的生活建设（这种建设在彼得格勒是按独特方式进行的，而且又最少），——这怎么不把自己弄到感觉生活非常厌恶的地步呢。

全国正紧张地进行着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那些不是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对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表现出首都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的中心所在的地方，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

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

对您的信我率直他说出了我的看法。从（和您的）谈话中，我早就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您的信把从您谈话中得到的那许多印象综合和固定下来了，总括起来了。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否则生活就会完全令人厌倦了。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1页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

在我看来，高尔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12日[25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2页